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

# 权力与繁荣

Power and Prosperity

Mancur Olson

[美]曼瑟·奥尔森 著 苏长和 嵇飞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

# 权力与繁荣

Power and Prosperity

Mancur Olson

[美]曼瑟·奥尔森 著 苏长和 嵇飞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与繁荣/(美)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  
著;苏长和,嵇飞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

书名原文: Power and Prosperity

ISBN 978-7-208-13991-6

I. ①权… II. ①曼… ②苏… ③嵇… III. ①新制度  
经济学—研究②行政干预—市场经济—研究  
IV. ①F091.349②F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4101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陈楠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

权力与繁荣

[美]曼瑟·奥尔森 著

苏长和 嵇飞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2.75 插页 4 字数 167,000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3991-6/F·2395

定价 46.00元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高韵斐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为松 王兴康 匡志宏 朱凌云

吴 申 忻雁翔 范蔚文 徐忠良

## 出版说明

出版作为人类思想和智慧的凝结，集聚了发明创造和社会实践的经验与成果，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飞速发展的数字和互联网技术并未削弱出版业的这一功能，反而前所未有地促进了其创新发展。

长期以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始终以弘扬主旋律、引领学术思潮、关注时代命题为己任，并围绕中国发展的重大事件、重大战略决策和重大理论问题举办“世纪中国论坛”。结合2016年“世纪中国论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融合移动端、语音端等新技术，以纸电一体同步发布的方式隆重推出《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实现了出版方式与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的融合发展，表达了出版人在奉献好书的同时，努力践行社会责任、文化理想的使命追求。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聚焦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主题，荟萃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熊彼特奖得主和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等中外著名经济学家的扛鼎之作，著译并重，经典闪耀。

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早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英文版中就预言，中国可能在2015年成长为

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从而恢复它在 1890 年之前所享有的世界经济地位。2014 年，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出版 20 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为图书新版撰写的长篇序言中特别指出：“出乎主流经济学界预料之外的是，中国经济在此书出版后 20 年却基本沿着我们在书中所预测的增长轨迹前进。”

然而，中国经济自 2012 年增速明显减慢，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一直处于下行趋势。经济学家们所预言的奇迹或增长赖以产生的基础是否改变？对于未来，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信心？

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吴敬琏在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一版（2005 年）中，就指出了转型、结构调整不能取得成效的很多具体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存在体制性障碍，核心内容就是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抑制或排除了市场的作用。他在第四版的序言中写道：“中国在 21 世纪面对着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体制改革，一个是发展转型。”

无独有偶，中国经济改革研究的先驱巴里·诺顿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一书中，全面描述和评价了 1949 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并把中国的制度转型放在经济增长的大框架里论述，既突出了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也突出了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显然，制度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和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在各自的经典作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与《比较制度分析》中，分别从东西方的不同视角阐释了制度的内涵，揭示了制度在经济发展和绩效中的作用。

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者曼瑟·奥尔森的遗著《权力与繁荣》则提出了“强化市场型政府”这一分析经济增长的前沿性概念，为金融危机后的亚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演变和经济政策提供了有用的分析框架。

对于那场起始于亚洲的金融危机，沈联涛用《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书进行了详细的解剖，并警示我们2017年可能发生的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对于可能引发危机的高杠杆问题，瑞典的邓达德等在《新国富论：撬动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一书中给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并因此被《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推荐为2015年度图书。

根据“十三五”规划的蓝图，中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实现收入翻番的必由之路，其目标就是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和配置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消除经济运行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因素，一方面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另一方面开启新的可持续增长动能，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我们将以出版更多的精品力作传播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世纪中国论坛典藏文库》编委会

2016年7月

## 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范蔚文先生日前打电话来，希望我能与奥尔森教授的《权力与繁荣》一书写一篇导读。老实讲，对此我很犹豫，因为关于奥尔森的文章，我先后写过几篇，其中的一篇还特别提及奥尔森和他的这部遗作。令我犹豫的另一个原因是，奥尔森在马里兰大学的同事查尔斯·卡德韦尔已经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在序中，卡德韦尔概述了本书的核心观点，点明了作者的方法论，总结了奥尔森整个学术生涯的精华。我如果再去重复，总觉得有画蛇添足之嫌。后来我之所以没有婉拒，除了受到热情邀请之外，还在于我觉得有一种义务在这里进一步谈谈我对奥尔森教授理论的理解。毕竟在马里兰，我在他的指导下阅读、思考了一年。

社会科学研究，我以为大致可归结为三大类问题：其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二是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三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前者涉及生产和分配过程中个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与之相关的概念有：分工、交易、企业、市场、契约、外部性等。中者关心



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如何恰当地规范政府行为以有效地保障个人权利。与之相关的概念是：财产权利、利益集团、政府管制、合法性、公共产品等。后者注重一国内部不同层次政府之间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博弈。与之相关的概念包括：相容利益、主权、国家兴衰等。毋庸讳言，上述三大类问题在许多地方又是相互交叉、彼此重叠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行为来界定的，而某国政府的行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日益受到他国政府行为的制约。至于集大成者，如果存在的话，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可算一支。

政治学的核心范畴为权力，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为国民财富之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亦即探寻繁荣的本源。繁荣来自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后者源于每个人的劳动创造和巨大潜在的得自贸易之收益的实现；以上又导因于分工与交易的深度与广度，而后者又滥觞于个人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受到保护的程度；能够实施有效权利保障的唯有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拥有垄断性的强制权力或暴力；鉴于政府既由人组成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些个人或集团的影响，故它同时又是个人权利受到侵犯的最大威胁；凡是协调好政府强权和个人权利保障之间关系的国家，便会走向繁荣，反之则衰败；繁荣与衰败在国家林立国际环境中方会凸显其意义；由此，经济上繁荣与否的问题便转换成了政治权力形成与运用是否得当的问题。权力与繁荣，或更具体、更极端地说，权力先于繁荣，或强制性规则先于自愿交换，或政府决定增长（因为没有政府，个人权利便无从谈起），乃贯穿奥尔森政治经济学始终的逻辑脉络。

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难以遏制的别出心裁加以解释的冲动，使奥尔森独秀于经济学家之林。概言之，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书可以说是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并在回答过程中奥尔森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业已广泛地

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国家的兴衰》(1982)则是他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国家之繁荣与萧条历史现象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他还进一步丰富了一些极有价值之概念或命题的内容,比如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分利集团以及个人理性并非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等。《权力与繁荣》(2000)通过引入政府权力于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繁荣程度。

这里需要特别感谢卡德韦尔教授。正是从他为《权力与繁荣》所撰写的序言中,我们得知在1997年秋天,也就是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前的四个多月,奥尔森主持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也恰恰是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奥尔森创造了一个可以高度浓缩其长期增长理论的重要概念: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尽管这个概念没有来得及添加进这部著作的草稿中,但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它逐步形成的轨迹。奥尔森在书稿中反复且多角度论证说,经济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存在可靠且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第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话说到此,“强化市场型政府”便呼之欲出了。

强化市场型政府设立的目标,在于获得所有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益。为此就必须建立一套法律体系和政治秩序来强制执行合同或抵押协议,提供负有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安排,并且保障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及有效的运转。在这里,财产权利、契约权利以及由此催生的资本市场,便成为区分市场强化程度之“色谱”的尺度,其两端分别为产权高度密集型和产权高度粗放型,各国的经济也就可以依此被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显而易见,为创新提供必要资本支持的金融市场属于高度契约密集型产业,因而对强化市场型政府的依赖性特别高。当把贸易领域和生产领域联系起来考察时,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产权密集型的经济通常对应的是资本密集型经济。其背后的逻辑十分简单,如果机器或工厂

总是面临着被没收或充公的风险，人们就不愿意从事资本密集型生产。这也顺带解释了在“产权—资本粗放型”经济中，往往是那些具有自我保护性质的产业比较发达，比如人力资本密集的手工业和种植业。

在实现了权力与繁荣的“对应化”或“因果化”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强化市场型政府”产生的逻辑或条件是什么？这里我们必须稍微深入讨论一下奥尔森首创的那个基本而意义重大的概念：相容利益。某位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某个拥有相当凝聚力和纪律的组织，如果能够获得特定社会总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他们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了相容利益。相容利益给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诱使或迫使他们关心全社会的长期稳定增长。与之相对的是拥有“狭隘利益”的个人或组织。鉴于它们只能享有或丧失社会产出增减量中的微不足道的部分，故他们对增加社会产出毫无兴趣，而仅热衷于再分配以寻求该社会产出的更大份额，甚至不惜损害社会福利。依据这样的逻辑，只要存在相容利益，即使是早在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统治者都会尽可能地保护个人权利，按照最优税率税则对其臣民征税，而不会竭泽而渔，以避免损害其收入长期最大化的目标。

经过这种转换，强化市场型政府的产生条件，也就等价于如何使政府或执政者具有相容利益的条件。对此奥尔森的回答是：民主政体，或至少是代议制政体。注意，奥尔森谈论的民主，其核心或本质不在于它是否赋予普遍公民选举权，而在于它是否保证了政府产生于自由的政治竞争过程，从而确保拥有相容利益的精英掌握政治领导权。他的这一思想倾向，与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中所持的立场如出一辙：政治的民主原则，即应该从争取选票的竞争性斗争中产生出来；民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人民总是可以被定义弄得他们像是在统治；除了在某程度上保证了言论和出版自由之外，民主和自由就没什么关系了。尤为令人深思的是，对民主有类似想法的人远不止熊彼特和奥尔森。譬如，早在1926年，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之一卡尔·施密特就曾写过一篇题为《论议会制和民主制的抵牾》的文章（载其《政治的浪漫派》）。他说，所有人作为人的平等，不是民

主,而是某种类型的自由主义;让最优秀最有能力的政治精英掌握政治领导权并承担公共事务,才是议会民主制的本质。

那么历史上和逻辑上的民主政体又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呢?换言之,由一个封建专制君主取代另一个封建专制君主的“常规”何以被打破呢?奥尔森的回答简洁而睿智:某种特殊情况的出现,或曰偶然性。当那些促使封建专制王权垮台数量不多的人物、家族或集团之间的权力出现了平衡时,也就是说当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够强大到使自己成为新的封建专制者时,民主政体也就有了可能。这一逻辑成立的另外一个必要条件是,不管是由于地理的还是其他幸运的环境因素,这个民主政体能够免遭周边国家的征服。许多历史和归纳研究证明,英国和美国等一些代议民主制的“自发产生”,便与上层权力的多元、平等分配和领土安全密切相关。虽然奥尔森在参考文献中没有提到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但从其著述的字里行间之中,我们还是不难发现阿克顿的影子。在《法国大革命讲稿》(1910)中,阿克顿反复地表达过他对“自由政体”的理解:政治科学强烈要求,必须靠多元和分立来操纵权力。

本书的一个辅助性的、但同时却是有趣的观点,是奥尔森对所谓“科斯定理”的批判和拓展。在他看来,科斯理论的核心在于交易成本和自愿交换,其基本结论是人们会为了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对此奥尔森评价说,“科斯定理”(亦即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个人理性可以通向集体理性)仅仅适用于集体规模很小的情况。一旦集团成员足够多,即使交易成本为零,其成员也不会受到激励去为集体产品的提供做出贡献,因为这时搭便车的潜在收益相对会更高。再者,科斯的理论只注意到理性的自利会使自愿交换产生互利结果,却忽略了理性的自利也会引导人们用手中的权力强迫别人就范的可能性。恰恰是后者才是解释政府的不同类型——强化市场型政府还是作为其对立面的政府——的有效工具或途径。还有,源于自愿交换之收益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契约的执行,而“契约如果没有剑作保证则等于一纸空文”(霍布斯语)。有鉴于此,奥尔森把强化市场型政府视为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设计。

关于发展中国家,奥尔森的逻辑结论认为,其落后的最大挑战不在于资源或资本匮乏,而在于它们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分工、交换等市场活动,特别是高质量的政府活动。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他发现发展中国家政府发挥的作用是比较小的。这一结论对于身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之国家的读者而言,初听来多少有些振聋发聩。但在知晓了奥尔森所青睐的是强化市场型政府之后,我们便可以依据如下三个指标对政府之功能加以比较:规模,结构,方式。仅就规模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普遍逊色于发达国家,这至少可以从政府雇员数量之众多和干预领域之广阔上得到反映。但就结构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政府重点发挥作用的领域和力度往往大相径庭,其关键差别集中体现在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他人或政府本身的侵犯上。要知道,人类生产的一个悲剧性原理在于:毁灭容易创造难,正如积长年心血建成的大厦会以一根火柴的代价而毁于一旦。在这里,强化市场型政府存在的意义又一次凸显出来。至于方式,则既涉及组织分工的原则和执行原则的手段,还与政府权力来源有关。

个人权利得到最有效保护的国家同时也是拥有最高人均收入的国家,或者说,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下是因为它们缺乏可靠的个人权利,构成了奥尔森在本书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当今世界的现实应该讲与这种判断相当吻合。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读者,我们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损害个人权利的掠夺行径,不仅来自封建专制政府或君主的无端没收和无政府状态下随处可见的侵权,也来自国家间的野蛮掠夺,其中也包括那些源自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文明”盘剥。昔日残暴的殖民者今天摇身一变都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这和它们现在都是最为“尊重权利”的国家一样,恐怕也并非出于历史的巧合。对这个近似于“鸡”与“蛋”的、同时也是事关重大的问题,奥尔森在书中予以回避了。他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如此,我们已无从知晓了。

对奥尔森的主要批评之一是针对他那简化和一以贯之的分析模型。有些人称他为“理论单一”的思想家,即总是用一种简单模型回答所有重大且

复杂的问题。其实,这恰恰是奥尔森之所以是奥尔森而非其他经济学家的根本所在,也是他毕生所追求的学术目标。奥尔森终身恪守如下的学术研究信条:“正如伟大的斗士总是力求刺中敌手的颈动脉那样,伟大的科学家总在寻找能够取得突破和具有强烈诉求的问题。故我以为,探求那些重大和高度简化的命题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战略。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自认为一直是这样做的。当然这也是我唯一想做的事。”对此肯尼思·阿罗评价说,奥尔森凭借简单模型对重大命题所做的解释,大都很能说明问题;奥尔森去世之所以是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就在于他与众不同,而其他经济学家大都相去不远。虽说他的思想形成有许多不同的来源,但我感觉奥尔森心目中的精神英雄是达尔文。他在多种场合都表达过对达尔文的敬意,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简洁、解释力强、而且覆盖面广阔。

奥尔森于1998年2月18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两周后《经济学家》杂志便发表了讣告,并在其遗像下配了一行说明词,把他称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该文在结尾处还做了一个合理的猜测:如果奥尔森仍然健在,那么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尽管不是完全没有争议,却很可能把他送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奖台。在奥尔森去世两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杂志又发表专文,评介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该文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三年前我阅读此书时便产生了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念头。后来我一边让我的学生李增刚翻译,一边联系出版社。当完成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也表示愿意出版时,我却得知该书的中文版权已经被颇具慧眼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买走。虽不无遗憾,但毕竟中国读者可以看到这部非常值得一读的著作了。当然,作为美国经济学教授,奥尔森的某些思想倾向、学术观点和秉承的理论传统,和当今中国的主导思想或观念还是有相当距离的,有些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在阅读此书时,我们还须以了解、批判、借鉴的眼光对待之。

张宇燕

2004年12月30日

## 序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思考着权力如何与繁荣相关的问题。其实，早在 1340 年左右，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斯伊纳(Siena)共和国的领导人就委托艺术家创造了两幅壁画，壁画的主题就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由安布鲁吉奥·劳伦扎蒂(Ambrogio Lorenzetti)创造的这两幅壁画，占据了整个斯伊纳九人统治委员会的议事厅，壁画的题目分别是《坏政府的寓言》和《好政府的寓言》。壁画为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所要探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早期的而又简化的看法。

在劳伦扎蒂的壁画中，坏政府是由一位暴君的肖像所代表的，他坐在断壁残垣前，主持邪恶堕落的政务：残暴、背信、欺骗、狂躁、分裂、好战、贪婪、骄傲以及虚荣如此等等。围绕着暴君形象的是各种各样的掠夺行为，例如战争、犯罪和对正义的践踏，它们均以中世纪公共艺术特有的戏剧和服饰表达手法表现出来。相反，在墙的右边，有个共同的善的形象，主持着诸如以智慧、和平、正义、信念、仁慈、高尚以及和谐为代表的好政府的事务。<sup>①</sup>《好政府的

寓言》里面的人物形象分成值得注意的两组。一组是士兵与囚犯，而他们的左边则是一群政务官员。这两个次要场景涉及的主题在奥尔森的书中得到特别的注意，其核心问题就是权力的运用及在这一运用过程中市民的作用。

与好政府的壁画相联的是两个画面，即好的城市和好的国家。这两幅画面展示了在成功的治理安排下出现的繁荣景象。在好国家的壁画中，农民在富足的土地上忙碌着，毛驴载着谷物在小山上悠闲地走着，它们的目的地则是好城市壁画中繁忙的市场。好城市周围则是载歌载舞的人们，街上热闹非凡，建筑物富丽堂皇。这些壁画对展示当时斯伊纳共和国内部的治理状态很有意义，但是委托做这些壁画的政权在1355年由于瘟疫和查理四世的外部威胁以及其内部的利益纷争而崩溃了。斯伊纳的发展立刻停顿了，但是它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很丰富的中世纪生活的博物馆，同时向我们揭示了善治的脆弱性。

在这些壁画之后的636年，一位新闻记者的问题促使奥尔森去追问为什么在坏政府崩溃以后不会出现经济繁荣呢？劳伦扎蒂用壁画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奥尔森则以经济学学科的训练与理论创新，用一生的时间在追问公共与私人繁荣的根源。本书就是奥尔森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回答。

奥尔森认为经济成功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对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外一个必要条件是没有任何掠夺行为。他注意到，这些条件以及由之而来的最好的经济效果，在那些制度能够使权威性的决策服从全局而不是狭隘利益，以及权利得到完全尊重的民主国家中，出现的可靠性最大。奥尔森指出，这些制度安排揭示了政府经济增长的类型。在小集团或者孤立的市场中，可能有契约的强制执行以及财产体制，而需要增长的复杂市场的发展则不能没有政府。没有民主政治制度的约束，就很难发展可信的财产或者契约执行体制。

奥尔森在对这个结论的研究中，予以苏联及其后继国家特别的关



注。但是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许多还没有达到经济繁荣的地方。就如劳伦扎蒂的壁画所清晰表达的，奥尔森看到了壁画背后的东西，因而去问为什么有些政府能够提供支持市场成长的公共物品而有些政府则抑制了繁荣的出现。

劳伦扎蒂壁画中内容的反差涉及的其实是治理的结果问题，但是关于后共产主义的辩论常常把国家与市场看作是不能比较而不是互相补充的两个东西。这种观点对历史上反市场的苏联来说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奥尔森指出，它对我们理解那些国家在促进繁荣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地方却是没有帮助的。

后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崩溃程度的差异，以及经济恢复速度的不同，与国家的强度以及国家如何运用权力有很大的关系。外部投资和国内投资的水平，新兴私有公司的增长以及其他转轨措施的运用，取决于国家提供基础制度以及克制自己掠夺行为这些因素。如果法院不能可靠地执行合约，或者法官不能强制执行合约，或者国家及其官员与私人投资纠缠在一起，那么国家就是短命的。虽然这个普遍的结论很容易就能做出来，但是奥尔森对政权的类型以及治理与影响增长的制度之间互动的特殊性还是给予了非常缜密的分析。

在写完本书的草稿之后，奥尔森创造了一个概括何种政府可以获得繁荣的词语。他认为，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合约，而且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如何提供强化市场型的制度安排确实是个包罗万象的问题，例如，从适当的法院和合约执行，到政府财政活动的管制或者教育的开放，等等。奥尔森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所强调的这些问题确实是现在许多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经济活动中能够说明强化市场型政府重要性的一个特殊例子是资本和信用市场，这些市场对制度的敏感性引起了奥尔森的注意。奥尔森问道：为什么在许多国家，技术和制度允许成万亿美元的资金跨国界